



高平叔 撰著

蔡元培 年谱长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一卷

蔡元培 年谱长编

第一卷

高平叔 撰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蔡元培年谱长编 第一卷/高平叔撰著.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ISBN 7-107-12757-8

I. 蔡…

II. 高…

III. 蔡元培-年谱 (1868—1916)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8) 第 24542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沙滩后街 55 号 邮编: 100009)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75 插页: 8

字数: 501 千字 印数: 1~1 100 册

定价: 54.00 元

出版说明

继《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10卷)、《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24卷)之后,遵循“服务教育,繁荣学术,积累文化”的宗旨,我们又策划了一系列重点教育图书。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南开大学高平叔教授撰著的四卷本、二百余万字的《蔡元培年谱长编》即是其中之一。该书在纪念蔡元培先生诞生130周年、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暨蔡元培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之际隆重推出,立即受到教育界、史学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海内外专家、学者或撰写评论,或发表谈话,对该书的出版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使我们和撰著者备受鼓舞。

为了迎接五四运动80周年和建国50周年,本着精益求精的原则,我们与高平叔教授商定,特出版本书修订版。高平叔先生以年近九旬高龄,为完成“蔡元培研究三部曲”(蔡元培全集、年谱长编、大传)而日夜拼搏。现全集、长编已面世,而大传尚未竣稿。惜天不假年,高平叔先生宏愿未成完璧而仙逝。蔡元培先生被尊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高平叔先生为弘扬蔡翁精神,孜孜以求,重诚守诺,奉献终身,其道德文章、高风亮节也在学术界树起了一座丰碑。谨以新版《蔡元培年谱长编》纪念高平叔先生。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年11月

为了蔡先生的嘱托

——《蔡元培年谱长编》自序

高平叔

(一)

这是整整六十年前的旧事。

1935年夏天，偶然和蔡先生谈到，广益书局所出《蔡元培言行录》与启智书局所出《蔡元培文选》，编制得太粗糙，建议蔡先生自编一部文集，蔡先生便叫我为他搜集整理，由他自己审阅。同时，书前须有一篇完整的传记。黄幼轩（世晖）先生只记到1918年为止；后面的蔡先生也叫我把它完成。

王云五（岫庐）先生闻讯后，找我商谈，约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定为《蔡子民先生的生平及其思想》。

蔡先生在其1935年8月5日的《日记》中说：“乃同〔我原名乃同，字平叔，抗日战争时撰文，多署名平叔，遂以字行〕到院，询民国八年后我之经历，笔记之。”这是蔡先生开始向我口述自传的日子。

蔡先生在其1935年9月25日的《日记》中说：“我在寓勘定

高乃同君所草之‘孑民文存’目录，除大多数可入选者著‘○’于目上外，其须阅后始定者，以‘、’志之。……决删者，以‘△’志之，计（一）《养成优美高尚思想》……（二）《大战与哲学》，（三）《怎样推行国历》。”这是蔡先生在青岛避暑时审阅我所寄去的第一批蔡著的日子。

蔡先生在其1935年9月26日的《日记》中说：“致高乃同函，附去‘文存’目录两份，‘孑民事略续稿’一份，快照的相片一纸，又寄广益书局《蔡元培言行录》一册于乃同，均挂号。”这是蔡先生由青岛寄还我送去的第一批蔡著，我所记蔡先生《口述传略》要点，以及蔡先生和我的合影的日子。

遗憾的是，我的搜集工作进展缓慢。这是因为，我当时任浙江省立嘉兴区民众教育馆长，总馆设在嘉兴，并在平湖、嘉善、海盐、崇德、桐乡设置分馆，我经常巡回于各县，而这个专区没有较大的图书馆，只能于出差杭州、上海时，挤时间去浙江省立图书馆和上海市图书馆等处查阅旧报、书、刊。幸而查到，还得托人代为抄录（那时没有复印），寄我整理，再汇齐若干篇，分批寄给蔡先生审阅，费事费时，迟迟未能竣事。

1937年“八一三”抗战后，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嘉兴区和杭州相继沦陷，我退至金华，结束了省立民教馆，绕道温州到上海租界区，韦恂（捧丹）、卢广绵诸兄留我参加孤岛的救亡工作。原想乘机搜集蔡先生的旧著，但因上海市图书馆及各大学图书馆位于江湾或沪西，被日伪占据，无法如愿。

路易·艾黎与卢广绵等去后方推行工业合作运动。1939年秋，我应邀赴西北助卢，离开上海，过香港，见蔡先生，想不到竟成永诀。由香港赴越南的海防、河内，转往昆明、贵阳、重庆、成都、广元，而至陕西宝鸡。当时后方交通阻塞，乘车困难。在黔渝道上，日机扫射，乘客下车躲避，卡车逃逸无踪，铺盖箱篋，

损失无遗。数年来辛勤搜集并经蔡先生批选的“子民文存”原稿，以及较详的蔡先生《口述传略》（下）改写稿，均丧失于流离道路之中，终天抱恨，莫过于此！

（二）

我原学经济，因襄助蔡先生做研究工作，兼修教育；抗日战争前，在教育界服务。此时参加工合，开始了经济专业的工作。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创设，为的是吸收沿海沦陷区撤退到后方的工人，为他们组织各种工业的合作社，生产军需和民用的物品来支援抗战。但因西北工合在延安设有事务所，不少爱国青年经宝鸡前往陕北，政治压力很大。刚巧，翁咏霓（文灏）先生以经济部长视察西北，约我去该部从事经济研究工作，我便于1942年秋离开陕西，到达重庆。

吴稚晖（敬恒）先生和翁咏霓先生询及“子民文存”的情况，我告以集稿散失，仅存所记蔡先生《口述传略》（下）要点及所藏蔡先生的几篇传记。吴、翁两先生催我编为《蔡子民先生传略》一书。经他们校阅后，吴先生特写了一篇序。接着，朱骝先（家骅）先生详加审阅，提出“应行改正及阙疑之处”十六条，并撰写序文，为我说明编著此书的用意。

蒋孟邻（梦麟）先生于返回昆明的前夜，将书稿翻阅一过。他对于蔡先生“长于推理而忽于记忆”一句提出抗议，说“蔡先生的记忆力是十分好的”。其实，那是蔡先生在我所记要点上自己加上的，但加有引号，当系引用《口述传略》（上）中“尚推想而拙于记忆”的笔误。根据蒋、吴、朱三先生的建议，仍改为“尚推想而拙于记忆”，以资一致。

黄任之（炎培）先生撰写跋语之后，王云五先生作了特殊安

排，于1943年3月5日之前赶印出来，配合了重庆各界为蔡先生逝世三周年所举行的纪念活动。

冯芝生（友兰）先生由昆明到重庆，见到此书，特撰《蔡先生的人格与气象——跋〈蔡子民先生传略〉》一文，发表于《大公报》。1989年，征得冯先生同意，将此篇改作蔡先生自传部分的跋，印入台湾版注释本《蔡元培文集》的第一卷。

在重庆期间，朱骝先先生告诉我：“傅孟真（斯年）先生曾说编辑蔡先生传记的资料是他的志愿。国立中央研究院并曾决定由傅先生所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搜集、整理及印行蔡先生的著作及有关蔡先生生平的资料。”傅先生由李庄来重庆时，我曾和他长谈，他说：他首先是搜集蔡先生的著作，编订文集。约定编就后，要我协助校阅，把蔡先生对各篇的取舍回忆出来，供他参酌。以傅先生的学识、声望以及史语所的条件，当时，我深为“蔡集”编订得入庆，同时，我也因此而为“子民文存”的流产稍减内疚。

（三）

我在重庆经济部，专研利用外资问题，写了几本书和一些论文，翁咏霓先生便派我赴美作进一步研究。1944年夏到纽约时，李石曾（煜瀛）先生正为国立北平研究院筹设经济研究所，要我和刘先纬兄负责筹办。为便于在美与各国经济学界联系，以Sino-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Inc. 的名称在纽约州立案，由李先生和张静江（人傑）先生任Co-Chairman，我和先纬任Co-Director。李先生常邀我去Bear Mountain，和张先生一同度周末，倾听他们闲谈四皓（吴、蔡、张、李）的旧事。张、李两先生对于“子民文存”的流产，深表惋惜。

在纽约，胡适之先生和我多次谈到整理蔡先生史料的问题。他

强调：应当特别注意搜集蔡先生所写的书信。因为，蔡先生一直担负繁忙的教育行政和学术行政的工作，与专事研究的学者不同，抽不出时间来撰写长篇巨著。但是，蔡先生写过大量的书信，不时阐述或流露自己的主张，这是一批极其珍贵的资料。胡先生说：他保存了蔡先生给他的所有信件，留在北平旧寓。彼此回国后，他可以检出蔡先生所写及有关的函件，供我抄录。可惜解放前我不曾归国，没有能及时收集胡先生及其他人士所藏蔡先生的手札。

(四)

1948年冬，我由美到香港，创办国际经济研究所。1952年迁至北京，并入中央贸易部。1960年，被下放到贵州凯里。“文革”时，备受酷刑、囚禁、凌辱、劳改。“四人帮”垮台后，1977年，乘西南“退休运动”之机北上，经过两年的奔走求援，始获户口、粮食而定居天津。

1979年春，一方面，京、津、沪、粤一些大学与科研机构约我重返国际经济的旧业；另一方面，蔡无忌兄与胡愈之、吴觉农、王芸生、徐盈诸老邀我去京商谈。

到北京后，全国政协特于1979年5月17日召开“征集蔡元培史料座谈会”，到会者，除胡、吴、王、徐、无忌和我而外，尚有钱昌照、何思源、钱端升、陈翰笙、顾颉刚、李平衡、戴伯韬诸老。他们谈到傅孟真先生早已在台去世，傅先生编订“蔡集”的志愿未能实现，而台、港等地所出“蔡集”，大都简略而草率，急需赶编一部完善的《蔡元培全集》。他们一致劝我放下经济专业，集中时间和精力，完成蔡先生1935年的嘱托。

会后，无忌和我畅谈数日。他说，蔡先生的日记、自写年谱及其他文稿，均藏于上海华山路故居，要我去上海整理。他郑重

声明：一切接洽和问题，均由他负责处理；我只是承担整理、编订全部遗文的任务。于是，我于是年6月底到达上海，在华山路故居作初步的整理，并往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处搜集蔡先生的手札以及旧报刊上的蔡著。

在北京期间，中华书局李侃、陈铮等同志慨然承担《蔡元培全集》与《蔡元培传》的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戴伯韬同志也要我赶编《蔡元培教育文选》一书，以应高校中国近代教育史教材的急需。

我由沪北返后，无忌和吴觉农、胡愈之诸老约我去京商谈。考虑到解放后在“左”的思潮影响下，蔡先生不仅不被重视，且有若干论述将他作为资产阶级教育家来批判，亟需设法获准举办蔡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的纪念会，为开展研究工作扫除阻碍，我找到1940年蔡先生逝世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信电，以及周恩来同志的挽联等，胡愈老提请全国政协递送关于举行纪念会的请示报告，经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批准，并为蔡先生加上“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的称号。^⑤1980年3月5日，“首都各界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大会”遂得以隆重举行。这一次的纪念会，对于此后蔡元培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确曾起到不小的作用。

关于整理蔡先生的遗著，我是纯尽义务。1943年出版《蔡子民先生传略》时，我在出版合同中载明：由商务印书馆将版税径寄蔡周养浩夫人。此次编订《蔡元培全集》，无忌提出的方案是：“由蔡先生子女提供家藏的全部资料，由高平叔编订。”“蔡先生著作稿酬处理办法，经商定：‘^⑥凡是过去未曾发表过的蔡先生著作的稿费，蔡先生子女及高平叔均不收受，立为蔡元培研究基金。’”鉴于我当时刚出牛棚，尚未落实政策，月领100元生活费维持一家三口（尚须支付一个肺癌患者的医疗费），无力前往沪、杭、宁等地搜集资料的窘况，复商定：“^⑦凡是过去曾经发表过的蔡先生

著作，由高平叔收取低微的编辑费，作为编订过程中所需川旅膳宿费及抄写、复印、拍照等支出。”1980年3月5日晚间，蔡先生子女和我在北京国务院招待所商议，一致通过上述办法。随后，柏龄、晔鑫、怀新、英多和我共同签订了书面的协议。

不幸的是，纪念大会后不久，无忌病剧去世。此后事务接洽上，失去了他的助力。

1980年，我先在天津、北京各图书馆、各有关人士处搜集资料。是年秋冬，在北京大学居住一个多月，举凡蔡先生在校时的存档文件及各种出版物，大都进行抄录、复印或拍照。

1981年，我去上海，借住华东师范大学招待所，每日到华山路故居，校勘、抄录蔡先生的日记，为时半年多。夏季，赴南京，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特别是主管全部档案的施宣岑第一副馆长的盛意，邀我住入馆内，为他们整理有关蔡先生各个时期的档案，使我得以将所需珍贵史料悉数抄录、复印下来，《蔡元培全集》中一千数百封蔡先生的书信，就是在该馆取得的。秋冬间，去杭州，查询未久，得北京电促，柏龄及其女洛莱由法到京，急欲相晤，遂匆匆离浙，经沪北返。

1982—1984年，我集中时间和精力，将已收集到的蔡著，校勘错字、脱字、衍文、古字、异体字，考订写作时间，比较不同版本，标点，分段，统一格式，按简体字逐篇抄誉，成为可供付排的原稿。分为第1—8卷，按时间顺序编排，适当平衡各卷的字数；将日记的上部（1894—1911年）置于第7卷的后半部，而将日记的下部（1912—1940年）编为第8卷。陆续交稿后，中华书局于1984年末印出第1—4卷，1988年秋印出第5—6卷，1989年秋印出第7卷。由于《日记》发排时，原稿被抽出，遂使《蔡元培全集》仅以薄薄的第7卷戛然而止。

当时，另编了一套“蔡元培选集”。这是因为：（一）《全集》

按原著写作时间先后编次，混合编排；而“选集”，则就学科性质，分别编为专册，使读者可按专题选取所需专册，无须通读《全集》。（二）当时认为，《全集》卷帙较多，不易在短期内出齐；而“选集”，则各卷独立成书，分别由几家出版社印行，可应急需。（三）《全集》中有相当一部分未曾公开发表的原著，这部分稿费，已决定立为研究基金。加编这套“选集”，其编辑费，我不收受，全部移作基金，可使基金数额，有所增加。

这套“选集”，已由河北科技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分别印行者，计有：《蔡元培哲学论著》、《蔡元培政治论著》、《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蔡元培史学论集》、《蔡元培教育论集》、《蔡元培美育论集》、《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等七本。尚有《蔡元培自写年谱》、《蔡元培书信选集》（上、下2卷）、《蔡元培日记》（上、下2卷）共五本，河北人民出版社已全部排出，并打成纸型，但随着出版业的危机，该社主持人认为销量较少，赔损较多，坚决不予付印。

1991年，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印行《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一书。这由于《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是全国教育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该丛书选辑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各位教育家的重要论著，蔡先生是首要教育家，必不可少。主编陈学恂兄一再坚请，不得不在《蔡元培教育文选》及《蔡元培教育论集》两书基础上，新增一百四十多篇蔡著，编成该书。

（五）

我在重庆经济部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淬廉）先生是该部的次长。我常去沙坪坝该所借阅西书，交换意见，关系颇为密切。1979年定居天津后，南开大学的友人约往担任国际经

济的教学及科研工作，我告以年过七十，难以承担两种不同的繁重任务。但滕维藻校长等仍要我为南开服务，经国家教委批准，聘我为历史研究所兼职教授（按规定，离、退休人员不恢复专职），从事以蔡元培为重点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科研与教学，负责培养研究生，其中，张晓唯、陈志科等曾撰写、发表研究蔡先生的论文三十余篇，张晓唯还于1993年出版一本《蔡元培评传》。

这一时期，国内、外各大学以研究蔡先生的学术思想为博士、硕士论文的，日渐增多，要求协助指导，如日本东京大学的藏田秀典，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的海博玛尔蒂娜、蔡洛莱，德国科隆大学的王佩莉，意大利威尼斯大学的法比恩，北京师范大学的程斯辉，厦门大学的张宝昆，华东师范大学的敖小玉等，我都尽力帮助他们。

（六）

1985年春，我去北京，将刚出版的《蔡元培全集》第1—4卷分送给亲炙过蔡先生的老人。吴觉农、胡愈之、王昆仑、屈武、叶圣陶、史良诸老，都在北京医院养病，当即在医院开谈话会（还找了钱昌照、钱端升、萨空了诸老来参加），商定：设法筹组蔡元培研究会，以为永久纪念和研究蔡先生的机关。经中共中央统战部与北京大学联系，老人们推派吴觉农和我为代表（由觉农之子甲选陪同）前往北大洽商，决定将蔡研会会址设在北大，并决定由北大的丁石孙、沙健孙、萧超然、梁柱、葛淑英和吴觉农、高平叔、卢广绵、吴甲选等同志负责筹备，随即拟定设立蔡元培研究会的请示报告，并制定蔡研会的章程，送交中共中央宣传部审核。直至1986年3月5日，国家教委批复：“同意成立蔡元培研究会”，挂靠在北大。

1986年4月10日，中国蔡元培研究会在北大开成立大会，推定叶圣陶、钱昌照、许德珩、陆定一、楚图南为名誉会长，梁漱

溥、吴觉农、陈翰笙、刘海粟、钱端升、冯友兰、潘菽、俞平伯等为顾问，选举丁石孙为会长，高平叔、沙健孙为副会长。

1988年1月11日，蔡先生诞生120周年，北京、天津、上海均举行纪念活动。天津各界纪念会上，印发了我撰写的《蔡元培生平概述》。上海静安公园所建蔡先生铜像，于是日揭幕，照壁上镌刻我撰写的碑文，云：

“蔡元培先生，号子民，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以名翰林投身革命，创光复会，入同盟会，参与辛亥革命，肇建共和。首任教育总长，奠立文教始基。迭赴世界各地，促进东西文化结合。出长北京大学，广罗人才，兼容并包，力主思想自由，扶掖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培植无数革命青年。创设中央研究院，发展科学事业。保障民权，援救革命志士。坚持团结救国，推进国共合作。方正廉明，言信行果，诚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940年3月5日病逝香港。哲人虽已云亡，遗教将永垂不朽。”

在北京，蔡研会不仅于1月11日举行献花仪式和报告会，以及首映《蔡元培生平》的电影，并于是年5月4日至7日召开蔡元培研究学术讨论会，国内外学者六十余人参加。会后，将论文三十八篇，辑为《论蔡元培》一书出版。

1989年1月，蔡研会决定在我所编《全集》及“选集”的基础上，另编一套注释本《蔡元培文集》，成立编辑委员会，推我为主编，萧超然、陶英惠两教授为副主编，梁柱等教授为委员，分任各卷的注释。分14卷，计教育2卷（梁柱），美育1卷（王世儒），哲学1卷（赵光武），政治及经济1卷（萧超然），史学1卷（张寄谦），语言及文学1卷（段宝林），科学与技术1卷（孙小礼）。其自传1卷，书信3卷，日记2卷，均由我注释。由于出版社迟未洽妥，直至1995年5月始由锦绣出版企业在台湾出版。

根据蔡研会章程第六条“以《蔡元培全集》的稿费及‘蔡元培选集’的编选费、以及募集捐款、补助款，建立‘蔡元培研究基金’，以举办蔡元培研究生奖学金及蔡元培论文奖金”的规定，我和丁石孙、庄守经、王世儒等同志往访孙越崎、古耕虞、马克强、屈武、刘海粟、钱昌照诸老，他们甚愿担任基金委员会委员，积极向海内外劝募捐款。但因“六四”事件后，丁石孙会长不再任北大校长，会务停滞，基金委员会因之未能正式成立。

1990年3月5日，绍兴各界隆重举行蔡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我应邀赴绍参加，并为《绍兴学刊》撰写《蔡元培与绍郡中西学堂》一文。

1994年3月19日，中国蔡元培研究会召开改选的会议。丁石孙、沙健孙两教授被改推为顾问。改选并组成第二届理事会，推举北大现任校长吴树青教授为会长，高平叔、梁柱、萧超然三教授为副会长。

(七)

关于为蔡先生撰著传记的问题，1979年秋，无忌、吴觉老、胡愈老和我商议请准举行纪念蔡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大会时，他们要我赶写一本《蔡元培年谱》（简编），备作大会的文件。我回津后，痔血猛泻，住院诊治，只能就手头资料及回忆，在病榻上口述，而由吾妻张奇（时患肺癌，翌年亡故）笔录，匆匆完稿，无法前往图书馆查对。中华书局如期印出，在纪念大会上分发。随后，国内外许多朋友来信或发表书评，认为过于简略，且指出若干时日不甚确切，建议改撰一部较详的《蔡元培年谱长编》。当时忙于编订《全集》，未暇及此。

同一时期，各报刊常来索稿。为适应不同要求，我把蔡先生一生的言行，列为几十个专题，分之可独立成篇，合起来不失为

别具一格的传记。已发表的有：《蔡元培的家世与家庭生活》、《蔡元培的科举生涯》、《蔡元培在翰林院》、《蔡元培与〈苏报〉案》、《蔡元培的游学生活》、《蔡元培与辛亥革命》、《蔡元培与民元教育改革》、《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蔡元培与五四运动》、《蔡元培与东西文化结合》、《蔡元培与民权保障》、《蔡元培对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蔡元培与孙中山》、《蔡元培与张元济》、《蔡元培与鲁迅》、《蔡元培与毛泽东》、《蔡元培与周恩来》、《从尼赫鲁写给蔡元培的信说起》、《蔡元培在天津》等四十余篇。拟俟全部写成，再删、并、调整，集为《蔡元培的生平及其事业》一书。

《蔡元培年谱长编》，原是南开研究生张晓唯、陈志科、邵建红、陈望东等人打算分工编写，最后由我统一修改，列为科研项目上报。他们毕业离校后，各有被派任务，我不得不独力承担。适于此此时，人民教育出版社，特别是副总编吕达博士，对此书极具热情，慨然列为重点。在该社赞助下，我开始了此书的撰著。随后，尽管出版业的形势极为严峻，马樟根社长和魏国栋副社长等同志，仍以学术著作为重，殷切支持本书的出版。

这部“年谱长编”，较之1980年所出“年谱”（简编，十万字），在字数上，将增加十几倍，分为四卷；内容上，亦将大为充实：（一）蔡先生的日记，除仅写“○○○来”四个字、或仅写“得○○○函”五个字之类外，凡有具体事实的，尽量录入。（二）十五年来陆续获得的史料以及重要人物写给蔡先生的重要函电，择要录入。（三）我曾以半年多时间，将1902—1937年的十几种旧报，如《苏报》、《俄事警闻》、《警钟》、《民立报》、《大公报》、《益世报》、《晨钟报》、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申报》、《北京大学日刊》及台湾版《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等逐页逐条检索，并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新青年》、《旅欧杂志》、《大学院公报》以及台湾《传记文学》等多种

刊物逐篇查找，发现了不少重要史实。

我非常感谢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承柏教授，他给予特殊的便利，使我能无昼无夜地从容地细阅各种旧报、旧杂志及库藏的珍本，使本年谱长编的内容得以丰富和核实。在目前许多图书馆热衷于创收的气氛下，冯教授和该馆同志却能真诚地为学术研究服务，确实是难能可贵。

周天度教授为本年谱长编寻找重要史料，并寄示他自己的笔记；耿云志教授为本长编查对胡适秘藏的蔡先生手札；杨天祥教授为本长编校订德语及译文；刘立德、蔡春、姚同发、罗真容、胡珠生、张国霖、刘建岱、王建平、江晓敏、焦艳婷、乔馥慧、刘红忠诸同志为本长编查找或核对资料；陈志科、张晓唯两同学为我核校本长编的初稿。对于他们，敬致至深的谢意。

(八)

蔡先生为李公慈铭编印《越缦堂日记》之后，在刊印缘起中曾说：“后死者之责，稍稍尽矣。”如今，蔡先生谢世，已历五十五寒暑；吴稚晖、翁咏霓、朱骝先、蒋孟邻、王云五、黄任之、傅孟真、李石曾、张静江、胡适之诸先生已先后作古；七十年代末发起纪念和研究蔡先生的胡愈之、吴觉农、王芸生、王昆仑、何思源、梁漱溟、顾颉刚、钱昌照、叶圣陶、史良、刘海粟、钱端升、冯友兰、屈武、许德珩、潘菽诸老已纷纷凋谢；蔡无忌、蔡柏龄、林文铮诸兄和蔡威廉大姐已不在人世。回首前尘，感慨万千。值兹受命六十周年之日，谨将蔡先生文集及传记编撰经过，奉告于诸先贤之前，亦曰：“后死者之责，稍稍尽矣！”是为序。

1995年8月5日于子牙河畔